

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文存

史海 新探

北京日报理论部 编

北京日报出版社

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文存

史海新探

北京日报理论部 编

北京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海新探 / 北京日报理论部编. —北京: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16. 5

(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文存)

ISBN 978-7-5477-2055-4

I. ①史… II. ①北… III. ①文史—中国—文集
IV. ①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8066 号

史海新探

出版发行 北京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 8-16 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 100005

电 话 发行部 (010) 65255876

总编室 (010) 65252135

印 刷 廊坊市博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 / 16

印 张 21.25

字 数 340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文存

编委会

主任

傅 华 赵靖云

委员

傅 华 赵靖云 伍义林

刘立志 李庆英 肖名焰

黄月平 魏志奇 张记合

主编

伍义林

副主编

李庆英 肖名焰

序

联系理论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理论研究与传播的最高原则。理论联系实际，既是党的思想路线，又是鼓舞理论工作者深入生活、联系群众、服务社会的响亮口号。

然而，对于在实践现场的实际工作者来说，理论联系实际这一判断还蕴含了一个重要前提：实际联系理论。

从宏观层面理论角度看，联系实际是检验理论、创新理论的不二途径。从微观层面、实践层面看，联系理论又是理性实践、科学发展的重要方法。

为官一方，责任重大，任务纷繁，面临各种矛盾和挑战。因此，务实勤政、少说多做、埋头苦干成了许多优秀官员的美德。但是，这些官员并不是一开始就扎入事务堆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的共同选择是：学习，研究，思考。“向理论求教”是共产党人的传统法宝，也是我们与时俱进、永葆先进性的当代经验。

因此，联系理论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刚性需求。

政治上的成熟源于理论的坚定。理论上坚定成熟，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摧毁我们。土能浊河，而不能浊海；风能撼木，而不能撼山。有了管根本、利长远的原理、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就能不忘初心，得其始终。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问题愈鲜明，理论便愈彻底，而社会对于理论的需求也就愈旺盛。事情往往是这样的：一个时代的问题既是绕不开、躲不过的困难和挑战，同时又是这个时代的实践者对发展、对未来的不停探索与大声叩问。

随着实践、发展的深入，问题便日益深刻且尖锐。而理论，便成为空谷回响，循声而来，绵绵不绝，振聋发聩。

理论是高峰。联系理论，我们便拾级而上，登上制高点。可以俯瞰，可以远眺，游目骋怀，开一新境界。事物纷纭，细节丛胜，关系复杂，若从理论的高度上看下去，一切便有了格局、脉络和方位。

理论是钻石。它是对过去的总结和未来的思考，是经典作家和无数思想者智慧的结晶。联系理论，我们便登堂入室，任导师、哲人们点拨、开示。情势再诡谲，矛盾再棘手，但我们学而有友、胸有成竹。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孤独地在特定时空完成一次工作，而是集结、融汇了一切智者的相关经验、思想和知识。众志成城，万物皆备于我。“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离开理论思维。这当然是就民族智性、思维品质而言的。实际联系理论，起点是主动学习、深刻把握、积极运用理论，但最高境界一定是在理论的引导下让自己获得“理论思维”这一卓越品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善于总结经验，抓取本质，发现规律，从生动多变的实践中演绎出新知识、新理论。

任何理论都追求有用性。马克思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理论必定只限于原理、规律和历史经验的供给。如果让学者抛开“概论”而直接画“施工图”，必定方凿圆枘，南辕北辙。同样，实际工作者“联系理论”亦须有眼光，有定力。一卷在手，了然于胸，不求即用，融会贯通。“风物长宜放眼量”，理论之树方常青。

傅华

目录

清代官员的“年终密考”制	邹爱莲 王金山	1
陈毅冷静耐心处理“郴州事件”	孙 伟	6
再识遵义会议	曲青山	10
古代的普法：讲读律令	徐忠明	15
正史中的武则天的正面与侧面	胡 戟	18
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	郑大华	23
县委书记邓小平	杨 东	26
古代中国人的日常法律意识	徐忠明	29
毛泽东和斯特朗谈话时间新考	时文生	34
羊是怎样走进中国传统文化的	王保国	40
县令欧阳修	赵冬梅	46
厚俸与薄禄的不同制度取向	杨 静	48
“六慎”与官德治理	于铭松	53
严复：强国必先铸民品	董永在	56
“不致妨孤寒之路”	刘佰合	60
清代的铁帽子王其实不“铁”	刘文鹏	64

文化只有古今之别没有东西之分吗	郑大华	69
一次历时88天的“整风学习的考试”	李东朗	74
承续张载“哲学四句教”的义理	刘梦溪	78
我们对中国古代法处在误解之中	马小红	81
对“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	张记合	84
明清士大夫休闲观蕴有积极因素	刘志琴	93
古代人才兴国的微型标本	张国刚	97
巡视制度：历代相沿的监察制度	余少祥	101
清代京官如何解决住房问题	张宏杰	105
持久抗战的真谛	陆卫明	108
三山五园是清帝“视事之所”	赵连稳	115
戴胄直谏明断案	林 乾	119
“打秋风”：明清官场公开的敛财怪象	郑金刚	122
“一篇持久重新读，眼底吴钩看不休”	曹应旺	126
鉴古明今的八大法制观点	张晋藩	131
曾国藩的领导力：并非权谋，而是理念	宫玉振	135
民间写史的境界	王艳勤	140
抗战期间牺牲了多少共产党将领	朱成山	143
为什么说共产党是抗战中流砥柱	张海鹏	149

清代的另类“车改”	潘洪钢	156
我党巡视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何益忠	160
家书记录的中国人民抗战心灵史	张 丁	164
恶劣风气折射民国社会深层危机	赵英兰	173
治史需要多重证据	岳庆平	179
“还中国一个历史的公道”	阮家新	182
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一环	马 勇	186
民国政治的一个怪象	游宇明	192
伯力城审判：沉默半个世纪的证言	孙家红	195
章太炎痛斥抗战投降派	肖伊绯	199
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问题	张海鹏	202
官箴与预防腐败的关联度	刘建民	206
对历史少一点误读，多一份尊重	石仲泉	211
“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李东朗	218
东方主战场：中华民族的壮丽史诗	张记合	222
别样怪圈：古代改革中“宏观调控”的消长	陈忠海	232
偏激止于理性，片面止于客观	余立新	237
国民党为什么打不好敌后游击战	陈 睿	241
一次民心向背的大检验	刘 琼	244

中国书院积淀的文化精神	朱汉民	254
古代社会怎样搞调查	水延凯	260
谈传统家规家训中可贵的育人理念	骆毅	264
再说商鞅	张国刚	268
最高人民法院大区分院设立与撤销原委考	何帆	272
谢觉哉家书中的情怀	张冠生	277
盛唐气象谁奠基	李大华	279
学问遇到权术，戏也，悲也	王开林	284
儒家“大同”思想新解	吴光	287
急进的政治改革易夭折	孙立群	291
认清儒家文化对现代法治的正面作用	王利明	294
中国三次城市化浪潮的启示	刘奇	299
清朝腐朽的起因探	杜家骥	304
谋事切忌“为浮议所动”	宫玉振	311
从史实中看到真实是十分重要的	黄月平	314
西汉的黄金是正式货币吗	李祖德	323

清代官员的“年终密考”制

邹爱莲 王金山

清朝管理官员，除三年对外官一次“大计”和对京官一次“京察”，以及履职引见、年终陈述等外，还有一项特殊的制度——密考。此制源于康熙时期的密折奏事，正式实行于乾隆朝，一直使用至清朝灭亡。由于考语清单是在每年年终奏报，所以密考也被称作“年终密考”。

这一重要的官员管理制度，因其机密性，并不载于公开的《大清会典》和《吏部则例》等国家大典之中。那么，这项制度是怎样形成和演变的，曾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我们今天该怎么评价这一制度呢？

由于密折的制度化，密考也由较低级官员对高级官员的秘密监督，逐渐演变为高级官员对低级官员的秘密考核

现存最早的密折是康熙朝的小密折，只有巴掌大小，十分便于秘藏。从密折的内容来看，康熙帝是希望通过暗中指定少数亲信不时地把地方上的所见所闻秘密进行汇报，以及时了解地方民情、掌握地方大员的动态。密报者的职位不高，但均是皇帝心腹。被考察的官员，范围并不明确，有大员也有小吏，以大员为重点。因此，康熙帝再三叮嘱奏报者：“凡有奏帖，万不可与人知道。”“凡奏折

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有时，康熙帝还会在密折中要求他们了解某种情况。如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皇帝在苏州织造李煦的密折中批示：“近日闻得南方有许多闲言，无中作有，议论大小事，朕无可以托人打听。尔等受恩深重，但有所闻，可以亲手书折奏闻才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李煦遂于当年十二月和次年正月连上两道密折，奏报他所了解的情况，内容涉及户部尚书、江苏巡抚等多名官员。

此时康熙帝对地方官员的秘密了解尚无明确的时间规定，也无内容范围要求，全凭奏报人与康熙帝关系的密切程度，或者根据康熙帝的指令随时随地奏报，还算不上正式的考察。

雍正帝继位后，面临吏治败坏、国库空虚的局面。他将密折视为推行新政的重要工具，建立了自缮写、装匣、传递，到批阅、发回本人，再缴进宫中的一整套规章制度，并扩大了密折的应用领域。康熙朝的密折多以官员“请安折”的形式出现，内容主要集中在地方官民动态。而雍正朝的密折上自军国重务，下至民间琐事，均有涉及。利用密折监督地方官员，更成为雍正帝驾驭群臣的一个重要手段，相关内容屡见不鲜。如年羹尧一案中，李维钧、田文镜等人在自己的密折里，均曾向雍正帝密报过年羹尧的一系列罪证，坚定了他惩办年羹尧的决心。

由于密折的制度化，雍正朝允许使用密折奏事者不再局限于皇帝的几个心腹官员，密考也由康熙朝时的较低级官员对高级官员的秘密监督，逐渐演变为高级官员对低级官员的秘密考核，并且这种考核越来越趋于制度化。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京官到地方出差时，要奏报沿途官员的情况。第二种是地方官员尤其是督抚履新时，须将赴任途中所见官员或原任地官员情况进行汇报。第三种是雍正帝专门要求某地官员对当地同僚情况进行汇报。如李卫任云南盐驿道时，雍正帝暗中嘱咐云南永北镇总兵马会伯：“朕闻李卫狂纵，操守亦不如前，果否？一点不可徇私情恩怨，据实奏闻。”（《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这些虽然都属于部分官员密访、密奏的非正常考核，但是密考制度已经呼之欲出了。

至乾隆四十九年，密考才渐成惯例，即每年年底，各省总督、巡抚要分别将所辖两司以及道、府官员贤否情况形成密考考语，以奏折形式密报皇帝

乾隆帝继位伊始，遇到了如何快速驾驭群臣、稳定政权的问题。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初八，雍正帝驾崩仅月余，乾隆帝就在两淮盐政高斌的奏折中批示：“南省督抚各大员优劣品行，朕实不知，可密奏来。”高斌随后上了《奏为密奏南省督抚并各大员考语事》折，汇报了江南省督抚及各大员的情况。

很快，这一形式被乾隆帝广泛使用。乾隆元年（1736年）三月，他首次明确训谕各省督抚：“朕即位之初，各省道府诸员，皆不深知其人。汝等可将各属员贤否事迹，各折奏前来。务须秉公甄别，以备朕录用。”（《清高宗实录》）从此，各省督抚均需对所属道府以上官员进行秘密考核，并及时奏报皇帝，密考制度开始向常规考核演变。

任何新制度的推出和实行，总要经过一个过程，况且因密考不在令典规定，不属于官员固有任内职责，虽然乾隆帝下了谕令，但各省督抚好像尚未完全领会皇帝的意图，开始奏报并不积极。所以乾隆帝经常在批览某位督抚奏折或某位督抚陛见时，亲自嘱咐一番，要求其对所属官员进行密考。乾隆三年六月初三，针对署理广东巡抚王昶（mó）在“各保府道贤员自行封奏”一事上的推托，乾隆帝特发上谕：“朕御极之初曾有旨，著各省督抚将属员贤否具折奏闻。彼时各省督抚皆陈奏一次，乃今并无一人陈奏者……岂必待朕谕旨屡颁而始为遵旨敷陈了事已耶？……似此均当随时奏闻。”这道上谕，也是乾隆帝首次明确密考应该成为一项制度。

至乾隆四十九年，因各省提督总兵选任的问题，乾隆帝又于六月初七发出上谕：“嗣后……其两司道府贤否，亦著各该督抚每年陈奏一次。”（《乾隆朝上谕档》）至此，密考渐成惯例。即每年年底，各省总督、巡抚要分别将所辖两司（布政使、按察使）以及道、府官员贤否情况形成密考考语，以奏折形式密报皇帝。

嘉庆二年（1797年），嘉庆帝进一步从制度上明确了年终奏报密考考语清单的具体要求，此后一直到清朝灭亡，密考制度从未间断。

密考形成制度后，与大计同时成为清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考核制度，而且密考有着自身的独特优势

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监督和考核，一直是历代王朝完善官员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清代以前各朝，中央对于地方官员的监督和考核，除设立常规考核制度外，还会通过设立专门机构，或向地方派驻专门人员等方式来实现，如明朝的厂卫制度等。但这种方式的结果却往往是考核者与被考核者逐渐合流，不但没有实现监督，反而造成了地方官僚机构的膨胀，增加了考核成本。在密考成为制度之前，清代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沿袭了明代的大计制度。大计由吏部主持，每三年举行一次，对地方官员的表现均有固定的考语。密考形成制度后，与大计同时成为清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考核制度，这是因为密考有着自身的独特优势。

其一，密考的对象范围更集中。与大计考核全体地方官员不同，密考的对象是地方道府以上中高级官员，范围更小，考核就可以更具体、仔细。

其二，密考考语与大计考语的侧重点不同，也更加详尽。大计作为对地方官员的考核，考语主要侧重于官员的政绩。而密考的考语则主要侧重于官员的能力和操守两个方面，内容相对比较丰富、生动。如贵州总督张广泗对署贵州布政使事的按察使陈德荣的考语为：“该员操守清廉、为人梗介、才具妥慎、办事诚谨。布政使为通省钱粮总汇，宣猷佐理职任綦重，该员洁己奉公、正身率属，虽尚未事事熟谙，然能勤慎小心、竭蹶办理，罔敢懈斁（yì，厌倦）。”这样的考语较之大计更加详细，更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一个地方官员的品行、能力及其工作状态。

其三，密考频率更高，且由皇帝直接主持。大计由吏部主持，每三年一次。逢大计之年，吏部按照《吏部则例》的相关规定通知各省督抚，督抚再行文布政使、按察使二司进行考核。考核完毕后，督抚以题本形式将结果上报给皇帝。密考则是督抚以密折形式直接将地方官员的表现汇报给皇帝，保密性强，且每年一

次，频率更高，意味着地方官员获得皇帝了解的机会也更多。

其四，密考一方面可以考核两司道府官员的能力和操守，另一方面，也是对总督巡抚的监督。由于密考考语是总督、巡抚分别对治下同一批官员做出的，如果两人对同一官员的考语不谋而合，则能让皇帝放心，得到认可；一旦督抚对同一官员的考语不一致，或前后任督抚对同一官员的考语不一致，则会引起皇帝的疑心，从而启动对相关官员的调查，这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了上级官员对下级的挟私报复。如云南布政使刘春霖，因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和三十三年前后两任云贵总督岑春煊和锡良对其所做的密考考语大相径庭而受到调查，最终于光绪三十四年被解职。这样，密考制度就借助一纸秘密公文，实现了在不增加专门机构的情况下对地方官员的监督和考察，既降低了监督成本，又提高了行政效率，最主要的是，该制度保证了对官员考核结果的可信度，成为清代在官员管理制度方面的重要创新。

但是，到了清后期，密考制度日趋形式化，各省督抚往往“以常语泛填”。如光绪三十三年，广西巡抚张鸣岐对布政使余诚格的考语为：“该员明足理繁、毅能决事、论其才力、堪胜艰巨。”对署提学使李翰芬的考语是：“该员气度端凝、性情谨厚、提倡兴学、不遗余力。”这时的密考考语越来越局限于这种四字一句、四句一人的格式，较之此制初创时，越来越僵化，所能反映的内容已经和大计考语没有太大差别，逐渐失去了密考原来的意义和功用。

（作者邹爱莲为国家档案局巡视员、研究馆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
王金山为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

陈毅冷静耐心处理“郴州事件”

孙 伟

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由于党处于幼年还不成熟，因而会犯一些“左”的错误，难免会引发群众的不理解，甚至对立的群体性事件，造成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比如湘南郴县的“反白事件”（亦可称为“郴州事件”）。后经有关部门和领导特别是陈毅的及时应对与纠错，事件最终得以成功解决。

湘南特委的“左”倾错误政策，传达到郴州后引起群众的强烈反对，最终酿成了严重的“郴州事件”

1928年初，朱德、陈毅等领导了著名的湘南暴动，革命形势大好。但在党中央“左”倾错误思想影响下，中共湘南特委开始推行某些盲动政策。尤其面对湘粤两省敌军的联合进攻，在“使小资产变为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口号影响下，湘南特委提出了“焦土战略”，为了企图使敌军进入湘南后无房可住，无法立足，硬性推行焚烧湘粤大道两侧30里内房屋和烧毁郴州等县城的决定。

指示下达后，朱德、陈毅和湘南的许多党员、干部，都对此进行了有力的抵制。但是，陈佑魁领导的湘南特委有意避开朱德、陈毅，召开特委会议。会议在没有民主气氛的情况下召开，决定：一方面，将焚烧范围缩小至湘粤大道两侧各

5里；另一方面，仍向各级干部施加压力，强令执行，没有商量余地。这样，一些干部只得在大道旁烧毁了少数房屋。

不久，消息传到郴州，不想立即遭到大部分群众的强烈反对。人们对此不能接受，并感到困惑，开始议论纷纷。有的人公开埋怨，以示不满，还有的公开谩骂县委。所以，县委通知3月12日在县城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拟由县委书记夏明震向群众做解释工作。但此时隐藏在红色堡垒中的反革命分子蠢蠢欲动，以大土豪崔廷彦为首的反动势力在郴县城郊骆仙铺秘密召开会议，参加的还有崔廷弼、钟天球等人，密谋磋商反革命暴乱事宜。他们还开始满街散布谣言，为暴乱做准备。

开会那天到场的人很多，还夹杂些身份不明的人。会前，愤怒的人群中就有人喊道：“赞成烧房子的站一边，不赞成烧房子的站一边！”于是，大多数老百姓都站到了不赞成烧房子的一边。对会场上出现的骚乱，县委负责人浑然不知。上午10时，夏明震一行来到会场，并没有觉察出潜在的隐患。大会开始，他上台发言，代表县委解释“坚壁清野”的理由。话音刚落，会场上立即引起一阵骚乱。紧接着妇女干部何善玉也上台讲话，阐明县委的苦衷。但群众表示不能接受，并表现出极度的愤怒。这时，台下有人叫喊：“烧房子就是不行！”“杀死他们！”钟天球领着几个暴徒手舞大刀蹿上台去，夏明震等人见状，赤手空拳与他们进行英勇搏斗，但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全场一片混乱。这时一些革命群众反应过来，也拿起大刀、梭镖、锄头等与之搏斗。顿时，会场变成战场，当场死伤200余人。暴徒行凶得逞后，又向县总工会、共青团训练班、少先队等机关团体冲去。一时间，整个郴州市内，一片狼藉。

就在当天下午，暴徒趁机四处散布谣言，许多受蒙蔽的群众信以为真。接着，在他们的煽动下，数千名不明真相的农民包围了事先已搬到城外的县委机关，并洗劫一空。

重新夺回郴州后，摆在陈毅面前亟须解决的是 如何正确领导暴乱后的整顿工作

事变的当天，就有一些干部和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突围出城，有的翻山越